大成之城

北京紫禁城的六百年

（上接9版）

“天字第一号”的大木墩子

“十一点，入内。封乾清宫东南屋。予与叔平先生、历史博物馆徐馆长等同组。午饭吃烧饼酱肉，清室代办。”

1924年11月10日，历史学家顾颉刚在他的日记里如此记载了当天的经历。其中提到的“叔平先生”，是后来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考古学家马衡，“徐馆长”则是甲骨文专家徐协贞。

这一天，对于紫禁城而言是个极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因为清宫物品点查工作从这一天起正式启动，意味着这座旧皇宫在向新式博物院转变的道路上前进了重要一步。

摘录历史当事人的叙述，是东雁翅楼策展团队的用心所在。为了增加观众对史实的亲近感，策展团队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遴选出几位亲历者的回忆文字，让这些熟悉的名字带领观众回到历史现场。譬如，讲到1924年的清宫物品点查事件时，就由几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亲自为观众担任导览——包括顾颉刚、李石曾、绍英、易培基和那志良。

这场规模浩大的清宫物品点查工作的由来，还要从1923年的建福宫大火说起。

1923年，一场神秘的大火，将建福宫上百间建筑连同无数古物珍玩付之一炬，损失不可计数。溥仪日后推测，这是因为他决定清点宫廷藏储，太监们监守自盗，只好纵火毁灭证据。

这场大火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清皇室保管古物的质疑，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政府设立博物馆，妥善保存国家文物。不久，“北京政变”爆发，摄政内阁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要求溥仪出宫。宫中物品，由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点查，移交政府，筹设故宫博物院。

1924年11月，由一批专家学者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进入紫禁城的后寝区域，从乾清宫开始，清点查验宫中每一件家具、陈设和日用品，逐一编号贴签，一笔笔详细记录，最终汇辑为6编28册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旧时传统的编号做法，是用《千字文》中的文字，逐字为序：“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因此才有“天字第一号”这个说法。那么，故宫里“天字第一号”的文物是哪一件呢？

时任故宫博物院秘书长的李宗侗日后在自传中回忆了这个有趣的典故：

“进了东边门以后，大家商量应该由何处点查起，于是我就提议，由右手第一件物品点起，以后就永远用这方法。但是这间不巧得很，第一号物品恰好是顶门用的大木墩子。”

作为首处点查的宫殿，乾清宫的编号用的是《千字文》中的第一个“天”字。所以，这一对乾清宫顶门用的大木墩子，就出人意料而又顺理成章地成了故宫博物院的“天字第一号”藏品。

古董版《故宫日历》

在东雁翅楼展出的诸多档案和图籍中，有一本小册子显得格外别致，这就是1933年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故宫日历》。

今天的《故宫日历》，是故宫出版社长销不衰的王牌产品，被读者们昵称为“红砖头”。它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当时还在草创阶段的故宫博物院，已经有了“服务公众，播扬文化”的明确定位，虽逢时世动荡，但在坚守古物之外，也开始致力于现代博物馆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文化传播和普及工作。

1933年，古物馆的资深编辑、书画专家冯华先生从故宫文物中遴选出一批精美图片，别出心裁地编辑成一本日历，既可当历书用，又能每日欣赏一件文物。日历面世后，在文人雅士中好评一片，被梁实秋先生誉为“日历中最佳之作”。

如今广受读者欢迎的《故宫日历》，其版面与装帧设计，是复刻自1937年的版本。而此次展出的故宫日历则更加“老资格”，是1933年的初版本，也就是这部传奇日历的第一个版本。

在那个信息传播不易的年代，小小一册日历，为民众打开了窥视故宫宝藏的一扇窗口，对于“服务公众，播扬文化”，确然功不可没。

为紫禁城测绘

20世纪30年代，北平城的古建筑笼罩在兵燹的阴影之下，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认为保存一套完整档案资料的任务迫在眉睫。当时，第一批留学归国的青年建筑师毅然承担起这项历史使命。从1934年到1944年，中国营造学社和基泰工程司先后对紫禁城建筑展开了两次系统性的测绘。

这两次测绘的主力人员，大都是刚刚从建筑系毕业的年轻学生，还有一些负责搭架子的工匠师傅。他们人数虽少，却以惊人的工作效率，在短短数年内，接力一般地完成了大量文物建筑的详细测绘。凭借简单的手工制图工具，他们绘制了数百张精美异常的建筑图纸，为20世纪初的紫禁城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当时的测绘全靠手工作业，这些年轻的测绘队员们不惧艰险，在脚手架上爬高上低，还因此戏称自己为“猴子”。留存至今的资料照片里，还有几个年轻人在祈年殿宝顶和瓦面上工作时的合影。其中一张照片背面俏皮地写着一行字：“猴子们都在休息”。

故宫守护者

当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在1930年向民国政府提出《完整故宫保管计划》时，时局动荡，前景难测，紫禁城的未来仍然隐藏在一片难以预料的迷雾中。

斗转星移，一代又一代故宫守护者的艰辛付出，终于让紫禁城安然度过了20世纪初的动荡岁月。1948年，古物陈列所和历尽流离辗转的南迁文物一道拨交故宫博物院，“完整故宫保管计划”至此宣告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建筑保护的接力棒，就交到了新一代的保护工作者手上。

民国时期的故宫博物院，虽然已经在建筑修缮和养护方面做出过不少努力，但对于年久失修的庞大建筑群来说，要想除尽病患，并非朝夕之功。新中国成立之初，紫禁城内仍然满目疮痍。糟朽的木结构岌岌可危，大量垃圾需要清理。当务之急，是建立故宫博物院自己的修缮队。

从临时工程队开始，故宫逐步招募人员，壮大队伍，组织起一支自己的古建修缮保护力量。在抢救性修缮工程开展的同时，故宫的管理者也在探索文物建筑规章制度的建立，并将测绘制档工作坚持不懈地推进下去。

新生的力量注入古老的建筑体内，随之而来的还有新的技术和新的理念。1957年，紫禁城西北角楼大木修缮工程竣工，施工人员和建筑专家们一道在工地合影留念。

千百年来，一砖一瓦修造故宫建筑的工匠从来没有资格留名，容貌和身影更是永远湮没在历史之中。在当代，这一状况终于迎来了转变：这张合影里，修缮角楼的大木匠师们，一个个都骄傲地拥有了自己的姓名。

神灵的轿舆

东雁翅楼展厅里，矗立着一座格外引人注目的黑漆小亭子，既像建筑，又像家具。它的名字叫作“请神位龙亭”，是明清两代皇家祭祀活动中用来抬行神位牌的器具，相当于一顶给神灵乘坐的轿舆。

围绕这座“微缩版”的小型建筑，故宫的保护工作者开展了历时两年的研究性保护工作。从勘察测绘、三维建模开始，到文献调查，再到科学检测，力图充分探查龙亭承载的历史信息。当然，谨慎的修复试验更是必要的环节，确保最终的修复方案不仅效果足够理想，也足够安全。

从龙亭表面的彩画上，采集一片微小的样本，在实验室里用各种仪器分析检测，就能得到有关材料和工艺的丰富信息。

显微镜下，层层叠压的油饰彩画痕迹，揭示出龙亭过往的秘密：100多年间，历代工匠曾经用不同的材料和工艺，一次又一次地修饰这座小小的龙亭。新的颜料层覆盖了旧的颜料层，如同年轮一般，记录下龙亭曾经的历史。

今天，故宫的文物建筑保护团队，正在将这套科学的保护方法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建筑和内檐装修，也在探索中开拓一条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修缮技艺的融合道路。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将600岁的紫禁城尽可能完好地交给下一代观众与保护工作者。

结语

几经战乱劫难的故宫，在20世纪的风雨中奇迹般得以保全。1987年，作为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群，故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举世公认的文化瑰宝。这是对几代故宫守护者努力的肯定；而故宫建筑的保护事业，依然任重道远。

在中国人眼里，木结构的建筑和人一样，是有机的生命体。每逢季节转换，人事更替，建筑也需要更换裱糊，改动布局。古代工匠将这种常规的表面修缮称为“见新”，是十分形象的称呼。草木一岁一枯荣，古老的木构建筑也在年年岁岁的修缮中，一次又一次重新焕发生机。

午门城楼上，策展团队在每个展厅的出口和入口处，都装饰了故宫不同季节的照片。四时风物，既是展览的绝佳背景，也是意味深长的隐喻：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古老的紫禁城建筑，也如同宫苑中的一草一木，循着自然的节律呼吸、更迭，逐渐融入山川与岁月。丹宸永固，生生不息。

春梦无痕

苏东坡的人生地理（中）

（上接10版）

经历了黄州的艰难生活后，身为地方最高长官的苏东坡，对普通民众更多了一份理解和同情。到杭不久，“岁适大旱，饥疫并作”。为了救治饥民，苏东坡向朝廷多次打报告，请求减免了包括杭州在内的整个浙西路（苏东坡还兼任浙西路兵马钤辖）三分之一的上供米，使得米价回落；又向朝廷请得度牒100张，销售后用来买米，以救济穷困者，“民遂免大旱之苦”。

苏东坡对医药也有研究，并能开处方。他在黄州时，家里来了一个老乡，名叫巢谷。巢谷向苏东坡传授了一个秘方，称为圣散子。巢谷要求苏东坡对着长江发誓，绝不把秘方透露外人。但苏东坡认为，秘方只有救治众生才能物尽其用，不久就把它告诉了名医庞安常，嘱庞安常写进医书。当苏东坡发现圣散子对流行于杭州一带的疫病有效后，制作了大量圣散子丸，派官吏带着医生，分头为百姓治病。

为了治标又治本，苏东坡拨出公款2000贯，自己再捐出积蓄50两黄金，在杭州建成一家医馆，取名安乐坊。安乐坊聘请懂医的僧人坐堂，每年从地方税收中拨出一笔经费维持运转。安乐坊的旧址，据考证，在今天杭州岳王公园附近的众安桥一带。

知杭州期间，苏东坡常常不在州衙办公，而是别出心裁地把办公室弄到了城外：他令手下人打着他的仪仗从钱塘门出城，自己却带两三个心腹家人自涌金门坐船横湖而过。当城里的人都站在街道两旁看知州出行时，他已在普安寺吃早饭了。早饭后，手下的小吏们在冷泉亭旁摆开桌子，苏东坡坐在桌前批阅文件。苏大人一目十行，目如闪电，其工作效率令人惊讶。处理了政务之后，他召集朋友或是同事在灵隐寺一带风景绝佳处饮酒赋诗，直到夕阳西沉，他才歪歪斜斜地骑马回城。

可以说，杭州知州任上的苏东坡是自足的，他既有身为地方长官的权力去按自己的意愿为民办事，也有身为诗家骚客的情怀去按自己的兴致享受生活。其情其景，略如其诗所云：

春来濯濯江边柳，秋后离离湖上花。
不羡千金买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

扬州：此生定向江湖老

扬州是江南的另一座美丽城市，它的精致与优雅，与杭州伯仲之间。它们相距不远，如同江南这篇锦绣文章的两个华彩段落彼此呼应。

扬州也是文人的扬州，唐人对它的赞赏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游人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俗语则认为，天下最快乐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结束了杭州和颍州的任职，苏东坡来到扬州，出任扬州知州。就像在杭州，苏东坡曾追寻过前辈白居易的足迹一样，在扬州，他则追寻了另一个前辈杜牧的足迹。

苏东坡来到扬州200多年前，唐代诗人杜牧曾做过扬州太守。苏东坡一定吟哦过这位先辈诗人在扬州时写下的著名诗篇：

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与杭州相比，扬州的脂粉气和诗酒味甚至更浓，从苏小小到杜牧之，从三分无赖是扬州到春风十里扬州路，扬州分明集中了江南的精华。非常遗憾的是，苏东坡在扬州只生活了半年多：仲春三月时下车伊始，秋风刚起时就匆匆离去，他甚至没能完整地体会扬州的四季更替。

在扬州市区文昌中路，街道中间的绿化带里，有一座不太起眼的石塔，遮掩于远处的楼房和近处的树丛中。如果不刻意寻找，很可能视而不见。这座石塔，是扬州一座曾经有名的古寺的遗物——古寺初创于晋代，后来多次重修，唐朝时因珍藏舍利而建了石塔，从此称为石塔寺。苏东坡到扬州后，即前往石塔寺观光。

石塔寺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它有什么绝妙的景致，而是一件广为流传的往事：

唐朝太原人王播，年轻时随父亲客居扬州。父亲死后，穷困无依的王播不得不寄食于扬州惠昭寺——也就是苏东坡所说的石塔寺。寺里每餐饭前都要打钟，听到钟声王播就前往饭堂吃饭。时间久了，寺里的和尚很讨厌他。一次，和尚们故意先吃饭后打钟，等王播来到饭堂，早已无饭可吃。王播深以为耻，在墙上题了两句诗：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

后来，王播飞黄腾达，出任淮南节度使，开府扬州，于是重游少年时吃过受气饭的惠昭寺。和尚们听说王大人要来，急忙把他早年题在墙上的诗用碧纱罩起来加以保护。王播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提笔在昔年的诗后又题了两句：二十年来尘拂面，而今始得碧纱笼。

苏东坡对王播的故事并不陌生，游这座不大的寺院，当然会想起王播。不过，与了解这个故事的人一般都是批评和尚们的前倨后恭不同，苏东坡所作的诗却表达了另一番意思，那就是王播既然受过人家和尚的一饭之恩，就应该心怀感激，而不是过了20年还耿耿于怀。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在绿化带看到的石塔，也就是苏东坡曾看到过的石塔，但它们的位置并不同——苏东坡时代，石塔寺在扬州西门外，南宋时迁址重建。岁月板荡，今天寺已不存，仅余石塔和一些以石塔为号的地名。

苏东坡是三月抵达扬州的。那是包括扬州在内的广阔江南地区（尽管扬州在江北，但文化上仍属江南）最美好的季节，古人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是也。

瘦西湖无疑是扬州的精华。这是一片自隋唐以来历代城濠连缀而成的水面，湖水一直与大运河相沟通，形成了不规则的带状。与西湖相比，它显得很“瘦”，很苗条。

瘦西湖西北侧，有一座建于隋朝的古庙：大明寺。自宋代以来，大明寺最知名的去处，不是佛殿，而是平山堂。

平山堂修建于庆历年间，它矗立于一座名为蜀冈的小山上，人立堂前，举目遥望，江南群山，似与堂平，因而得名。不过，对苏东坡而言，清丽的风景固然宜人，但他前往平山堂的原因，乃在于平山堂的修建者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文坛领袖、曾任扬州知州的欧阳修。

苏东坡一生三到平山堂。最后一次，也就是他知扬州任上。这一次，他写下了一首《西江月·平山堂》。词里，他深情地回忆了须发皆白、状若仙翁的欧阳修——现在，唯有墙壁上的墨迹还能证明：他曾经在这片秀丽的风景中，留下过自己的笑声与脚印：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扬州以产芍药花而出名，大奸臣蔡京曾做过扬州知州——蔡京比苏东坡小十岁，1070年中进士，但升迁速度却超过苏东坡。1085年，苏东坡刚离开黄州时，蔡京知扬州；等到苏东坡知扬州，已是1092年。

蔡京任上，每年都要以官府的名义举办万花会。万花会需展出芍药达十万株以上，所需费用都向民间摊派，老百姓深以为苦。可谓官方热闹几天，百姓困苦几年。

苏东坡到任不久，快到以往举行万花会的日子了，属吏们照例向他报告，想听听这位新大人的意见——万花会该搞多大的规模，每户人家该征收多少例钱。令属吏们意外的是，苏东坡竟淡淡地说：从今年起，就不要再搞了吧。

对于此事，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花会检旧案，用花千万朵，吏缘为奸，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然风景，免造业也。

林语堂曾称赞苏东坡是一个有现代精神的古人，我的理解是，在苏东坡身上，体现了现代语境下的民本思想。在扬州，除了停办万花节外，另一件事情也可为证。

赴扬州时，苏东坡与儿子苏迨、苏过同行。他曾多次屏去随从，亲自到村落访民疾苦。当时，麦子快熟了，但许多农民流落外地，不敢回家收麦。他询问后方知，每逢丰年，官府就要征收积欠——也就是历年欠下的债务。苏东坡向两个儿子感叹：“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民畏催欠，乃甚于水旱矣。”老虎够凶残的了，水旱灾害比老虎凶残百倍，而官府的横征暴敛又比水旱还凶残。到任后，他上书朝廷，请求免除积欠。但朝廷不同意。夏天时，扬州周边瘟疫大作，他再次上书，这一回终于打动皇帝，下诏宽免一年。苏东坡为之兴奋作诗：“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颓然笑阮籍，醉几书谢表。”

知扬州任上，苏东坡57岁了。他的性格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从他不断地唱和陶诗看出来，那就是他的心性越来越趋向平和与冲淡。那是一种经历了大绚烂之后的平和，也是一种沐浴了大风雨之后的冲淡。

苏东坡在扬州写了一组多达20首的诗，题为《和陶饮酒二十首》，陶就是陶渊明，他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喜爱、最自觉声息相通的前辈。从苏东坡到陶渊明，其间是600余载的悠悠岁月，但这岁月也不足以阻隔大师之间的血脉相通、精神相继。

扬州半年，苏东坡和以前一样，几乎天天饮酒。不过，他的酒量越来越小，不知是身体不佳还是为了养生有意少饮。这位以把盏为乐的老人，小酌几口就酣然入睡，从浓睡中醒来后，他开始工作——有时写诗作文，有时挥毫画竹，有时书写陶渊明诗作。

总之，历经了少年的得意与中年的困顿和觉醒之后，这位平静而慈祥的老人打算就这样颐养天年——以前，他曾经想终老黄州。不想，人算不如天算，出黄州后，他继续着走马兰台类转蓬的人生。如今，他希望在地方官任上致仕并安度晚年。

然而，苏东坡完全没有想到，他的晚年不会那么平安恬静。命运是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没有人知道它到底要流向哪里。

即便智者苏东坡。

……

1092年九月，朝廷将苏东坡调往京城，任龙图阁学士、兵部尚书——很显然，这一提拔，仍是出自一直欣赏他并重用他的太皇太后高氏之手。不久，转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东坡毕生功名，至此达到巅峰。

然而，盛极必衰，9个月后，高氏驾崩，哲宗亲政。和祖母完全不同，哲宗是新政的积极支持者。这时候，作为旧党重要人物的苏氏兄弟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尽管苏东坡名义上是皇帝的老师，然而，就在哲宗亲政当月，苏东坡被罢去礼部尚书，派往偏远的定州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定州知州。

从京师调往边地，这只是打击的第一步。半年后，更大的打击随着一纸诏令传到定州：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与贬谪黄州相比，贬谪惠州更加令人绝望到窒息：黄州虽偏，毕竟还在内地；惠州却远在瘴气弥漫的岭南；并且，贬谪黄州时，苏东坡45岁，年富力强；贬谪惠州时，苏东坡已近六旬，风烛残年。

尤为甚者，贬谪惠州还只是苏东坡晚岁流贬生涯的开端。以后，道路更加遥远，风物更加恶劣，宵小的迫害更加疯狂。

这一切，苏东坡不得不独自承受。

共和国的美学长廊

序跋

汝信

由《美与时代》杂志社和郑州大学出版社协力推出的《美学人生：中国当代美学家、美学学者的学术之路》这一鸿篇巨制，开始和读者见面了。这是我国美学界的一大盛事，值得我们重视和庆贺。本书收录的内容主要来自《美与时代》杂志十年来所设的“美学学人”专栏，其中汇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美学领域内从事研究、教学和普及工作的历代美学家和学者的学术经历和体会。从老一代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开创当代中国的美学研究事业，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在我国美学论坛上的不少成绩卓著的学者，直至改革开放后到新世纪崭露头角的一大批青年美学研究者，这近百位美学研究者的亲身经历，组成了新中国一道丰富多彩的美学长廊，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学事业发展的一个真实的记录。

本书的体式也颇有特色，它没有采用通常那种“评传”的格式，而是由作者“自述”与师友的“评述”、回忆相结合，“自述”不设限制，可以畅所欲言，就一些美学理论问题各抒己见，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不少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理论。总之，通观全书，向我们呈现出新中国70年来几代学人在美学领域内辛勤耕耘，薪火相传，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往直前，推陈出新的亮丽景象。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本书为研究当代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权威性的第一手资料，称得上是“必读书”。

但是，我以为，本书的当前价值不仅在于回顾过去中国美学走过的历程，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的还在于展望未来，使我们更认清发展中国美学应走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在这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本书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

第一，近百年来我国美学的发展历程昭示我们，美学研究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土地，紧密地联系现实的社会生活，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文化艺术实践中吸取营养，才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形成有我们自己特色的中国美学。在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中，美学是既古老而又年轻的一门学问。在西方，美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它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产生很晚，一般认为直到18世纪的德国才正式诞生，连“美学”这个名称也是由鲍姆加登命名的。在中国，早在先秦诸子那里就有丰富的美学思想，以后延续发展两千多年而未中断，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可是，我国过去传统的学术文化中，美学研究也并未形成独立的专门学科。应该说，近代意义上的美学学科在中国的诞生，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是20世纪初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等学界先辈受西方哲学和美学思想影响而努力引进的产物。西方美学传入中国，的确带来了一些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方法，给中国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美学的发展。但如果它们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脱离中国的现实生活，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那就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照抄照搬外国的理论无法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因为解决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美学这一学科在21世纪的中国能否繁荣发展，发扬光大，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创造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和话语体系。

第二，美学的发展应体现时代精神，适应该时代人民大众的要求，才能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当前，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这是我国美学工作者应该自觉肩负起的重大使命。我们要努力学习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去观察和解决当代美学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与时俱进推动我国的美学研究不断创新和发展。要明确地认识，我国新时期的美学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于人民的需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特别要强调指出，美学工作者应大力开展美育的研究和推广，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艺术和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通过美育，可以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使情感得到陶冶，思想得以净化，品格得以完善，从而使人身心得到健康发展，特别是在新的历史环境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可以有力地抵御和消解金钱崇拜、物质至上、消费主义、利己主义等对人们心灵的腐蚀，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一代又一代新人。因此，这是关系到建构新的民族精神，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一件大事。

第三，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美学要取得创新发展还必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这样才能在21世纪世界美学中取得应有的一席之地。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学遗产，而且应该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美学思想成果，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美学发展所取得的新成就。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闭门造车、固步自封是没有出路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学研究者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对国外美学研究状况的了解，但相互间的真正的对话和思想交锋还较少。中国美学未来要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影响，看来还需做很大努力。另一方面，在国内，美学的发展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这就要大力提倡学术民主，开展自由的学术讨论，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发扬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对于美学界过去历史上的不同学派的意见分歧和争论，要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正确对待，实事求是地通过平心静气的学术讨论去解决，即使不能取得一致也应允许有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美学繁荣发展的最好保证，这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已经证明了的。本书的编选正是遵循了这一方针。

最后，衷心希望本书会成为广大读者了解我国美学发展和现状的向导。